

◎滋味书架

2016 这些人，这些书

书是人类的朋友，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即将过去的2016年，哪些人和书值得回味和珍藏？本文从不同侧面回顾2016年的读书热点，为读者的阅读生活带来一份沉淀和思考。

杨绛：优雅而高贵的灵魂

杨绛，是钱钟书口中“最贤的妻，最才的女”。她通晓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，翻译过《唐吉珂德》等作品。她淡泊名利、与世无争；博学多才，治学严谨；无私奉献，用千万稿费资助寒门学子……杨绛的文人风骨、治学态度与社会担当，是当代人身上所稀缺的闪光点。

杨绛最喜欢的一句话是：“简朴的生活、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。”在把钱钟书数量惊人的手稿整理出来并交付出版后，她写了《我们仨》，写尽了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，感动了无数中国人。96岁时，她又推出《走到人生边上》，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。103岁时，九卷本《杨绛全集》问世，其中就有她为《洗澡》创作的续作《洗澡之后》。2016年5月，她安然离去，留下身后一段令人唏嘘不已的中国百年史。

钱理群：坚守并传承人文关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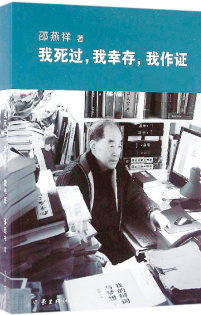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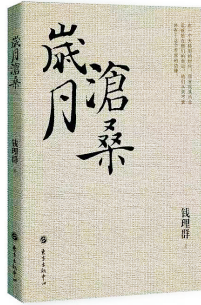
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钱理群逐渐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。近年来他不断与青年人以各种方式交流对话，从校园到社会，从书斋到企业，每次登台演讲，都融合了专业发现与现实省思，震撼了无数听众。

钱理群深情地关注着民族与人民的命运，坚守并传承着人文关怀。2016年2月出版《二十六篇——和青年朋友谈心》，7月出版《一路走来——钱理群自述》与《风雨故人来——钱理群谈读书》，8月出版《岁月沧桑》，以生命体验书写知识分子精神史。即使他隐入养老院，即使他说自己已经逐渐放弃了“教育”，退出了学术界，但他还是放不下青年：“在做完了可以、可能做的一切之后，将我的祝福送给年轻的朋友。”

贾平凹：记录乡土中国的变迁

贾平凹是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，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有长篇问世。他的《秦腔》《古炉》《带灯》《老生》，总能让人感受一个时代的命运。2016年4月出版的《极花》，表面上是写被拐卖的女子，实则是写作家内心的恐惧与无奈，更是写作家对乡村沦落的担忧。书中，贾平凹用真情的文字记录着乡土中国的世纪变迁。

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成就斐然，散文创作也毫不逊色。2016年5月出版《自在独行》，11月出版《愿人生从容》，他从生死、慈悲、天地、人事等角度，以朴实而又睿智的笔触，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，给孤独焦虑者以心灵的抚慰，让人们了悟生命的本质和人生的真正意义。



曹文轩：确立中国儿童文学的自信

2016年4月，曹文轩获得素有“小诺贝尔文学奖”之称的国际安徒生奖，代表中国作家第一次站上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领奖台。正如颁奖词所言：“用诗意如水的笔触，描写原生生活中一些真实而哀伤的瞬间。”曹文轩的获奖，无疑确立了中国儿童文学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一份自信。

在中国文坛，曹文轩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他写儿童和成年人都可以读的作品，孩子们读到的是精彩的故事，而成年人则能从中感受到美学的境界。曹文轩作品的力量在于感动，在于悲悯的精神。其代表作有《山羊不吃天堂草》《草房子》《青铜葵花》《火印》等。其中《草房子》出版18年来，一直未从孩子们的书架上消失，印刷了300多次，销售超1000万册，诠释了经典文本的魅力。

格非：坚守心灵的故乡

格非与苏童、余华并称“先锋作家三驾马车”。早年，格非因短篇小说《迷舟》蜚声文坛，后凭借长篇小说《江南三部曲》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，是当代实力派作家。

2016年6月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望春风》中，格非以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身份，为自己生活的乡村立传。故乡是维系远方游子的根，是纾解乡愁的魂，更是我们每个人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。格非在小说中不仅描绘了一幅美丽的“故乡画”，而且构筑了一幅触及中国农村境遇的“嬗变图”。他写出了每个异乡人心中的乡愁，同时引发了人们对现当代中国农村变革、发展的思考。

王树增：永不言败的理想信念

2016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。7月，军旅作家王树增的《长征》在出版10年后，又迎来了最新修订版。修订版新增7万余字，分上下卷，全景式展现了长征的历史。王树增说：“寻找历史是为了寻找心灵着落点，而我也想年轻人从中获取力量。”他所看重的，不是介绍历史常识或揭秘什么历史真相，而是去发掘在极端的战争条件下，形成的信仰与精神力量，以及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当代年轻人的意义。

王树增是一位创作态度严谨的作家，他创作的《抗日战争》《朝鲜战争》《解放战争》等作品，注重以细节还原历史面貌，描写永不磨灭的信念。《长征》是一本士兵的史诗和悲歌，不管司令员还是炊事员，都是历史的主角。《长征》在写什么？王树增说：“四个字——永不言败。”

邵燕祥：历史性的思考与自省

邵燕祥是当代杂文大家，却不是文化时尚人物，他的书一般很难“疯售”。然而，2016年8月出版的《我死过，我幸存，我作证》却一个月卖了一万多册。该书通过个人经历，呈现从1945年到1958年的中国思想文化断代史。这样一本严肃的大部头，实在考验人们的阅读耐心，但是却不少作而畅销。

作为一个直面历史的人，邵燕祥在自传中充满反思，重新审视自己、解剖自己。这本书之所以畅销，正是自省精神在当下的显现与“畅销”。因为一个民族能够正视自己的历史，并从历史中吸取教训，是其生命力的重要表现。尤其在面对艰难险阻时，困惑、颓废与骂街，远不如历史性的思考与自省更加有力量、有价值。

据《河北日报》

◎精彩书摘

煊赫旧家声：张爱玲家族



冯祖贻/著
新星出版社 2017年版

丰润张氏算得上百年来的家族，这个家族祖孙两代出现了像张佩纶、张爱玲这样的著名人物。

张佩纶是清朝名臣，光绪年间“四谏”之一。中法战争马江之役打了败仗，充军察哈尔，获释后当了相府贵婿。张佩纶与李鸿章爱女李菊耦的婚姻一时被传为佳话，《孽海花》生动地记述了这件事。

张爱玲是张佩纶、李菊耦的孙女，她出生时已进入民国，前辈的光环早已褪色。她从小

便显露过人才华，又早早逃出家门，年仅二十多岁便以一系列传奇故事震动文坛，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最红的女作家，后一度沉寂。

20世纪60年代至今，在一浪一浪的张爱玲热里，她赢得了比李鸿章、张佩纶更高的声誉。

张爱玲说得好，封建时代的文人“是靠统治阶级吃饭的”，“学成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”。（《童言无忌》）丰润张氏、合肥李氏的先辈都是耕读人家，直到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、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才通过科举步入仕途。张印塘病逝于镇压太平军的战场上，张氏家族一度中衰；随着张佩纶少年科举，官场一路顺风，家族又兴旺起来；马江之役失败，张佩纶第一个感触便是“家道中堕”，幸而李鸿章与张印塘的交谊帮了他，联姻又为张氏家族注入新鲜血液。可见封建世家的命运总是与时代、朝政、科举、世谊、婚姻联系在一起的。

剧烈动荡的近代社会也在考验着世家大族，一部分家族顺应潮流走上中体西用的路子，合肥李家办洋务、在通商口岸置产业、让子孙学西文即是一例，张家自然亦步亦趋。辛亥革命风暴席卷全国，许多王孙贵胄遭没顶之灾，张氏、李氏的后裔只是断了入仕之路，仍能在租界当寓公。这便是民国初年遗老遗少多集中在上海等几个城市的原因。

张佩纶与李菊耦的婚姻使相府门风影响了张氏后人，他们的爱子张志沂（号廷众）与李

鸿章一样饭后“走趟子”，能将古文、时文、奏章倒背如流，但时代决定了他不能成为第二个李文忠公。而只能当一个遗少。生活在十里洋场的遗少们从不拒绝西式的物质享受，住洋房、坐汽车；也不放弃祖辈的特权，抽鸦片、娶姨太太和家家长威严。两者的结合，只能使这个家族更加腐朽。

终于有人向他们挑战了，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，张志沂的妻子黄素琼（又名逸梵）、妹妹张茂渊走出家门，出洋留学，成为时代新女性。她们带回了西方文明，于是围绕着张爱玲的培养和教育，出现家塾和学校、闺秀和淑女、中学和西学之争。集中在张爱玲身上的家族矛盾，实质上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不同价值取向，是时代的矛盾。张爱玲后来写的小说既传统又现代，也正是这个转型期中西文化相互冲撞和相互包容的结果。

张爱玲步入文坛时，进入她眼帘的是她周围的家大族无一例外地走向没落。旧世家大族没落的原因，首先是他们无法适应变化了的世界，做官无门、经营乏术是普遍的苦恼，而在他们身后站着有政治后台的新家门，他们只能从世代传承的领地退出，李鸿章嫡孙李国杰将招商局让给四大家族即是一例。其次是封建主义加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，刺激了他们的欲望，而他们只能卖土地、卖房产，从根本上动摇了世家大族的经济基础。张家是这样，李家是这样，任家（张爱玲六姑奶奶

家）、黄家（张爱玲舅舅家）无不如此。第三是强烈的物质欲望造成家族成员的道德沦丧，维系世家大族的精神纽带彻底崩溃。第四是新思想的出现，家族中一代又一代人挣脱家族桎梏，走向新生。

丰润张氏的几位女性——张爱玲的母亲、姑姑和张爱玲本人都先后离开家庭，成为旧家族的叛逆。

张爱玲知道，原属于她和她的家族的世界在破坏中，更大的破坏还会来，所以她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充满鸦片烟气味、没有希望的家。但她自幼年起受的教育和参差对照观察事物的方法，又使她在回首眺望时，产生了依恋和凄凉的身世之感。她写的小说，不管是上海故事或是香港传奇，都笼罩着苍凉的气氛。她同情在旧式家族中苦苦挣扎的男女，为那个时代写下了一曲曲扣人心弦的挽歌。

相府门风虽然影响了张家，但并不意味着丰润张氏没有独特的思想和性格的传承。从张佩纶到张爱玲，中国文化人的清高和孤傲都体现得十分明显，趋时和避世之间也掌握得恰到好处，这是与李鸿章一味热衷权势的最大的不同点。当然，祖孙两代人因时代不同、性别不同，表现也就有了差异。张爱玲是张氏家族中最后的贵族。有人说，“就是最豪华的人，在张爱玲面前也会感到威胁，看出自己的寒伧”。又有人说，“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和极度的孤寂”。